



古来提及帝王武功之盛，而国力强大的，莫不会想到汉武帝。

素有“诗史”之称的杜甫，在他著名的《兵车行》中写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借汉武帝讽唐玄宗，表达了对长期征战、烦扰百姓的批评态度。杜甫在《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之一提到，“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却是以期待的态度渴望汉武帝那样的君主了。诗人态度的反复与矛盾，指示了汉武帝武功之盛的复杂性。其成败之间，自有值得后人追索处。

汉武帝伐匈奴

汉文帝、景帝两朝注重与民休息，至汉武帝时，国力达到空前强盛。《史记·平准书》记载：“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僭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武帝乘此强大国力，欲成就古来帝王都未达到的功业。北逐匈奴，南并南越、东征朝鲜、西通西域，开辟国土，威震四海。民国时期夏曾佑完成的《中国古代史》将汉代视作中古极盛之时，指出“中国之境，得汉武帝而后定”，此论已经成为了今日的共识。

四境征伐中，耗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汉匈之争了。

匈奴是活跃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族。秦灭亡之时，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日渐强大，史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横绝中国北部边疆。汉高祖统一天下，欲与匈奴争锋，中计被围于白登，此后不得不通过和亲交换取得与匈奴的和平。此后高后、惠帝、文帝、景帝各朝，均奉行与匈奴亲和的政策，实是由于国力不足，且不欲重烦百姓之故。

汉武帝少年即位，意气很盛。他以《公羊传》赞成齐襄公弑九世之仇为依据，将高祖以下困于匈奴的历史

“武皇开边意未已”——汉武帝武功之盛的思考

□ 曲柄睿

当作世仇，企图一雪前耻。

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策划了在马邑围歼匈奴主力的方案。匈奴单于率主力十万余南下，至马邑外百余里发现有诈北还。此役汉军无功而返。

此后汉武帝任命卫青、李广、公孙贺等人为将，数次北伐匈奴，沉重打击了匈奴的有生力量。特别是每次出征汉军都俘获了匈奴大量人口、畜产，有力地破坏了匈奴的经济生活。其中战略层面大战，主要有三次。

元朔二年春（前127），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此役最大意义在于收复河南地。河南地是古黄河河道与秦昭襄王长城之间的地域。本为秦将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得之地，后失于匈奴。卫青此役重得河南地，取得对匈奴作战的地利优势。汉于此设立朔方、五原郡，形成对匈奴作战的前沿。

元狩二年（前121），为沟通汉廷与西域之间的联系，打通河西走廊，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与河西匈奴决战，收降匈奴浑邪王部数万余众，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后于此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此役收到了“断匈奴右臂”的效果。匈奴人作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足见此役对匈奴打击之大。

经此二役，匈奴势力急转直下。汉武帝决定发动对匈奴的战略决战。元狩四年（前119），卫青率五万骑出定襄，霍去病率五万骑出代郡，追随他们的步兵及负责后勤人员有数十万之众。卫青、霍去病两部直驱漠北，寻找单于主力决战。单于部队与卫青

遭遇，战败向西北逃遁。霍去病歼灭左贤王部精锐，后于狼居胥山刻石记功，此役之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武帝征匈奴的战略目标完全实现。

从“李广难封”看汉武用将

汉武帝征伐匈奴，之所以取得盛大功业，有多种因素支撑。如国力盛大、士民选练等等，其中可以进一步申明的是汉武帝用将不拘常格。

李广和程不识同为汉武帝时名将戍边，统兵风格大相径庭。每出击时，李广“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是一种比较散漫的风格。程不识则“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是一种较为严谨的风格。当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比较而言，似程不识不如李广善为将。

既然如此，王勃感怀“李广难封”，确乎可以成为武帝不识人而士不逢时的千古定论了。

不过如果考虑到对匈奴作战的具体情况，似乎又不能作此理解。自汉立国以来，边境上与匈奴的战术多为防守反击式。匈奴入寇，汉军追袭，双方各有死伤，而互不能为制。李广自汉景帝时期，屡任边将，对这套战术模式非常熟悉，甚为时人赏识，至有典属国公孙昆邪评价他“天下无双”。而且李广在战斗中常率小部队执行侦察任务，约以百骑为限。凭借过

硬的骑射本领，他往往能脱身而返。但身为将军统帅，李广却不善于指挥大部队作战。李广为将军出雁门，一度被匈奴生擒，恐怕与他冒险进军有关。后来李广指挥大部队作战，也多以失败告终。

李广的知识和技能，作为基层指挥官，绰绰有余；而作为高级指挥官，每每捉襟见肘。《孙子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轻易的态度对待战争，战争将回以猛烈的痛击。李广被人赏识的，终究是他的英雄气概和战斗技能，而非统帅才华和指挥才能。

这时，就愈加看出汉武帝用将的英明之处了。

汉武帝一改过去面对匈奴时防守反击的战术，实行用骑兵追击合围的战术。为此，就要培养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就要选择一批适应既有战术能力又有战略眼光的将领。他倚重的是新成长起来的卫青与霍去病。

卫青是武帝卫皇后之弟，因女宠与汉武帝亲近贵幸。但他并非是个凭裙带关系求取富贵的浮浪子弟，很快成长为汉军的主要将领，担负起攻击匈奴的主要任务。卫青的战术特点就是擅长骑兵大兵团作战，他常率领万人以上骑兵军团，长驱匈奴腹地，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也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与他的舅舅一样，霍去病更擅长远距离奔袭。如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将万骑，转战千余里，大破匈奴折兰王等部。《史记》称霍去病“敢深入”，不只是对他勇敢精神的

肯定，也透露出汉军作战思想的变化。正因为卫青、霍去病等一批“敢深入”将领的大量涌现，汉军的战果才日渐辉煌。

赵翼《廿二史札记》肯定汉武帝用将，不计流品，“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可谓自出机杼的言论了。

汉武帝选人不计较出身。如与张骞同出使西域者数辈，多为轻险不轨之人。究其原因，就是汉武帝看到此行前途未卜、凶险莫测，必用“妄言无行”之徒，方能成功，所以才“募吏民无问所从来”。

将军出征，或有沿途贪墨军资财货者，如李广利；或有迷途失机者，如张骞、赵食其；或有折损士卒者，如李广、公孙敖，汉武帝均不拘以文法，使立功自新。诚所谓“使功不如使过”，如此则将士用命，无不奋力。

深陈既往之悔

虽然对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但汉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汉书·西域传》中班固指出，汉武帝连年征战，使“民力屈，财用竭”，遇到灾异，则“寇盗并起，道路不通”。《五行志》说“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食货志》说，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后来“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可见，汉武帝后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已经很严重了。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宣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同年，田千

（上接1版）同时，污染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庞大产业，巨大治理需求已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增长点。以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为例，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燃煤锅炉整治、煤改气煤改电、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三项措施对GDP产出拉动分别为129亿元、1310亿元和8219亿元。

三大攻坚战的政治考量

打好三大攻坚战，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社会政治问题，是对我们党驾驭风险、跨越关口的能力检验，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担当尽责、攻坚克难的作风检验。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意义。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并从治国理政、长治久安的高度多次进行深刻论述，展现了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政治智慧。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10年前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都警示我们金融危机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解决不好会对国家总体安全形成很大威胁。早在2013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经济变动对亚太金融市场、资金流动、汇率稳定带来挑战，增加了本地区经济金融风险。我们要注意防范风险叠加造成亚太经济金融大动荡，以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政治社会问题。”此后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2017年4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金融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没有金融安全，国家安全体系就难以得到有效支撑。面对各种形式

金融风险，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胸怀全局、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实现贫困群众脱贫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我们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长期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多种形式的反贫困斗争，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真心实意为民造福、为民谋利，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曾引用古语，“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强调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从讲政治高度切实抓好精准扶贫工作，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高度出发，保持顽强的工作作风和拼劲，满腔热情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生态环境问题解决不好将导致严重社会政治问题。近年来，环境污染重、生态受损大、环境风险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从长远角度看，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都会伤及人类自身。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意识不断提升，环保投诉居高不下。据原环境保护部统计，2017年，全国环保举报管理平台共接到环保举报近62万件，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提升环境质量、解决好百姓关注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对我党执政的新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指出，“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有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把以

人为本的生态观发展为政治意涵丰富的生态民生政治观，他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他强调，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三大攻坚战的人民情怀

安居乐业、蓝天碧水、清新空气、资产安全……一桩桩、一件件，都寄托着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打好三大攻坚战，既关乎党和国家大局，又关乎百姓千家万户，是回应民众强烈呼唤的民生工程，是体现浓浓人民情怀的民生工程。

金融安全关系着老百姓的钱袋子。随着资产配置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理财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已经和金融有了亲密接触。2017年底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已近30万亿元，各种理财产品背后往往关联着银行、证券、债券、信托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近些年，线上线下非法集资等金融乱象严重危及人民群众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就是在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在论及金融问题时，人民群众利益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重点。“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朴素而平实的语言，既蕴含着深刻的经济思想，也体现着深厚的人民情怀。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采访时深刻指出：“股市涨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预。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发展普惠金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这些重要论述告诉我们，推进中国金融业发展，既着眼金融业自身繁荣，还必须坚决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维护广大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

精准脱贫事关数千万群众基本生活。经过多年奋战，现有贫困问题涉及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地区，需要帮扶的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

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每到一处地方调研，总书记都要到贫困村和贫困户了解情况。这几年，全国11个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总书记都走到了。2012年担任总书记后来到革命老区河北阜平访贫问苦，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截至目前，习近平总书记40多次国内考察都把扶贫开发作为重要内容，在陕西延安、贵州贵阳、宁夏银川、山西太原、四川成都等地主持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不仅要实现贫困群众不愁吃、不愁穿，还要实现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三保障”，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人民领袖对普通群众的真切关心和深厚感情。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我国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迅速扩大，但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却在减弱。人民群众对蓝天碧水、清新空气、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呼声和要求越来越强烈，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这块短板亟待补齐。环保事关民心，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打赢环境保护攻坚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他还多次强调，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为改善生态环境，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年年坚持、一以贯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绿色发展理念中的人民情怀，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环境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向全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三大攻坚战的世界贡献

三大攻坚战直指的突出现实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共同挑战考验。回望过去，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为化解全球性难题作出了令人瞩目的积极贡献，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展望未来，打好三大攻坚战，将为全球治理提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我们贡献“中国探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金融风险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在国际金融风险面前，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有着高度的清醒与警觉。近年来，在一系列整治市场乱象、遏制资金脱实向虚的政策引导下，我国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有所下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银监会与中国保监会合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动作频频，瞄准的就是监管不协调、存在监管真空等问题，为防风险提供更加持久稳固的体制保障。我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也将为稳定全球经济作出重要贡献。我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所坚持的“在改革发展问题解决”战略思维，“结构性去杠杆”基本思路，都将为全球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提供有益借鉴。

精准脱贫，我们贡献“中国样本”。贫困问题始终是人类共同的挑战和考验，反贫困是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放眼全球，很多老人、妇女、儿童依然饱受饥饿和贫穷的折磨，目前全球仍有数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发布的2017年《发展融资：进展与展望》报告显示，如果不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家层面的行动，到2030年，全球仍将有6.5%的人口面临极度贫困的威胁。为更好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把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减贫。30多年来，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支出1.9美元标准，全球贫困人口持续下降，这其中我国扶贫成就居功至

秋为宰相，封富民侯。田千秋数月间由小吏而至宰相，在汉代是从未有过的。汉武帝此举，更表现了自己改弦更张的态度。

此后，一直主持汉财政工作的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议武帝于西域轮台地区设置屯田，此举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采纳。《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深陈既往之悔”。诏书最后，他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此汉武帝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代，终止了对外出击的国策。

后代史家每每将汉武帝与秦始皇、隋炀帝并举，批评他们空耗民力。《贞观政要》记载房玄龄说：“昔者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敝，实此之由。”《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总评是：“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这些批评，无疑很有说服力。

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中指出，武帝虽劳民其过，“而其救饥民也为得”，能“乘其时而为民利”，也观察到了汉武帝政策中内在的积极因素。不过汉武帝晚年能够完成政策由武向文的转向，也被看作汉能避免重蹈秦亡覆辙的原因。

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一文中指出：“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秦亡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此基础上，田先生更提示：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图往往无法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定。“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其可挽回之方。桀暴罪己，此旨可谓酷切，但是既非其时，又无其方，不足阻遏王的锋锐。”这样富有见解的思考，是值得借鉴的。



伟，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高达70%，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未来3年我国将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到2020年如期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完成现行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将提早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现象”目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彰显，也是“四个自信”的具体体现。我们不仅把中国减贫方略、减贫经验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共享，同时还尽最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贫，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污染防治，我们贡献“中国力量”。地球只有一个，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共同梦想，近年来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土壤侵蚀等大范围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尔托巴耶夫大学同答学生提问时明确表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饱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深刻认识。当前，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合理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环境严峻挑战，增强了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多年来，在解决国内环境问题的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已批准加入30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定书。中国的努力，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完善全球治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全球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挑战、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开辟了广阔空间。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源头防治，打赢污染治理的标志性重大战役，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四个结构”，做到“四减四增”，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这将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环境问题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